

杜威與五四新自由主義

• 高力克

杜威的新自由主義

十九世紀以降，隨着歐美自由資本主義秩序的形成及其社會矛盾的凸顯，自由主義經歷了從古典理論向修正的現代自由主義的嬗變。自由主義的蛻變，起於政治自由主義與經濟自由主義的分道揚鑣，它在叛離古典自由主義的放任主義傳統時演變為國家干預型的新自由主義。1914年爆發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使自由秩序分崩離析，並且開創了一個充滿戰爭和暴政的時代。十九世紀晚期出現的各種思想和實踐上的非自由傾向達到極致。面對社會主義之「社會正義」和軍國主義之「富國強兵」的左右夾擊，自由主義在西方處於風雨飄搖之中。反諷的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中自由主義啟蒙思潮的興起，正是以西方自由主義的衰落為背景的。

1919年五四運動前夕，美國實用主義哲學和新自由主義代表人物、哥倫比亞大學教授杜威，應其中國弟子胡適等人之邀來華講學。杜威旅華講學，為五四時期中西文化交流的一大盛事。他在南北各地演講近百次，其著名的「五大講演」風行五四時期的知識界，出版一年即印行11次。

1919年五四運動前夕，美國實用主義哲學和新自由主義代表人物、哥倫比亞大學教授杜威 (John Dewey)，應其中國弟子胡適、陶行知等人之邀來華講學。杜氏的新自由主義繼承了進步主義時代的樂觀精神，又參融了社會主義的平等觀念。在社會經濟問題上，他同情社會主義的正義與平等理想，對古典自由主義的個人主義、自由放任主義持批判態度，並主張對經濟活動實行社會控制，以國家干預的福利政策實現平等的自由。在政治思想上，杜氏是一個具有社群主義傾向的民主主義者，他反對民主精英統治論，而將民主歸為現代社會的一種廣泛的生活方式。杜氏謂其自由理論為「戰鬥的自由主義」。杜威對自由主義的批判和重建，體現了二十世紀新自由主義從個人自由轉向平等和福利、從自由放任轉向社會控制的基本題旨。

杜威旅華講學，為五四時期中西文化交流的一大盛事。杜氏來華，正值五四思潮的激變時期，他在南北各地演講近百次，其著名的「五大講演」風行五四時期的知識界，出版一年即印行11次。杜氏旅華講學中所宣揚的社會政治思想，其要旨如下：

(1) 社會的民治主義和經濟的民治主義。民治主義的元素，可分為政治的民治主義、民權的民治主義、社會的民治主義和經濟(生計)的民治主義。社會的民治主義，即平等主義，如打破不平等的階級，消除不平等的思想，求人格上的平等。經濟的民治主義，即打破經濟的不平等，鏟除貧富階級的差別。

(2)「平等」包含了民治主義之個人與社會雙重理想。「自由」偏於個人，「博愛」偏於社會，而「平等」則總括個人與社會兩方面。在民主國家中，英國偏重自由而不主張平等，英國式的自由只是反對國王或政府無限制的消極自由，英人的平等觀念亦只是法律的平等而非社會的平等。法國則最重平等，法人將平等視為自由的基礎，如果說1688年的英國革命是爭自由的革命，那麼1789年的法國革命則為爭平等的革命。而美國的民治主義則綜合了自由與平等兩觀念，它主張每個人都有自由發展其潛能的平等機會。

(3)「積極自由」與「消極自由」。自由有消極與積極之分，自由的第一要素，是精神或心理的特性。自由的真義，是要使人人有創造的能力，自思，自行，自決，自裁。解除外界的束縛，是消極的自由；養成創造的能力，才是積極的自由。古代爭自由，多半是消極的。真正的自由，一定要有智理的發展以及創造和裁判的能力。

(4)個人主義與放任主義批判。個人主義主張個人的自由契約、自由選擇和自由發展，反對國家權力的干涉。這種放任主義的基本缺陷，在於構成其基礎的自由契約，實際上是一種擁有資本、機器的資本家和出賣勞動力的無產者之間的不平等契約。正是這種不平等契約，導致了工人超長的勞動時間和非法待遇。此即放任主義的流弊。自由主義的困境表現了其內在固有的理論矛盾。自由與平等不是並立的。種種經濟界、勞動界的不平等，都起於自由太甚。新自由主義正是旨在以積極的社會控制來調和自由與經濟平等之間的衝突。

(5)基爾特社會主義或工團主義。此派社會主義主張以工會、工團和行會的聯合為基礎，實現勞動者對生產的管理權。這種工人自治式的社會主義正合乎民治主義的精神，可謂之「工業民主」。這是一種改良式的溫和社會主義。西方近來政治、社會的變遷趨勢，是以法律政治組織和社會公道去消除不公道現象。目前西方最重要的問題，是用國家的勢力來平均社會，逐漸消除社會的不公道和不平等。

(6)國家保護型的中國現代化方案。中國的現代化應借鑒歐美工業社會的歷史經驗，在個人自由與社會平等之間取得平衡。中國不必經歷西方先以個人自由發展、而後以國家權力實現社會平等的發展階段，而宜兩步併作一步，同時並舉。因為中國自古就有孟子的保民政策學說傳統，而向來沒有個人主義政治學說，因而可將古代父母式的皇帝保民政策，變為民主的保民政策。中國今日正處於工業革命未興之時，應從速普及教育，預備將來機會平等的能力。

杜威的新自由主義是對古典自由主義的批判和修正。作為美國新自由主義的思想代表，杜氏對古典自由主義的個人主義和放任主義的批判，對自由社會中社會正義問題的關注，對積極自由的推崇，以及其調和自由與平等、市場經濟與國家干預的思想，表徵着十九世紀晚期以來自由主義從古典形態向現代形態的演變趨向，並且預示着其後凱恩斯主義和羅斯福新政自由主義的興起。杜威關於中國現代化應鑒取西方資本主義的歷史經驗、走一條國家保護型的工業化新路的主張，以中國古代威權主義傳統與現代干預主義之親和性立論。這種民主保民政治型的現代性方案，注重東方集權傳統與英美自由傳統的歷史差異，並且提出了西方模式的困境以及中國走非西方現代化道路的問題。這正是1919年處於現代性典範危機中的中國知識界所關注的中心問題。

杜威的新自由主義是對古典自由主義的批判和修正。杜氏批判古典自由主義的個人主義和放任主義，關注社會中社會正義問題，推崇積極自由並調和自由與平等、市場經濟與國家干預，表徵着十九世紀晚期以來自由主義從古典向現代形態的演變趨向，並且預示着凱恩斯主義和羅斯福新政自由主義的興起。

杜威與五四自由主義的演變

杜威的新自由主義對五四時期的知識界產生了廣泛影響，它不僅對新興的社會主義思潮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而且為自由派抹上了自由社會主義色彩。杜氏注重社會經濟改革的新民主理論，頗受新文化領袖陳獨秀的欣賞，此時他對社會主義興味正濃。陳在〈實行民治的基礎〉一文中，闡揚了杜威的民治主義觀念及其社會主義意蘊。在他看來，杜氏關於社會經濟的民治主義詮釋，實為各派社會主義的共同主張。而杜氏所推重的美國式自治組織，則為陳的直接民主式的民治主義提供了靈感。

杜威的新自由主義更深刻地影響了其中國門徒胡適以及自由派的政治思想。五四以後，胡適的政治思想轉向反對放任主義和資本主義，並且公開標榜自己信奉「新自由主義」和「自由的社會主義」。在〈研究社會問題底方法〉一文中，胡將「社會立法」以保障工人勞動條件和福利，歸為社會改良的一種有效方法。胡還在一篇總結晚近五十年世界哲學的論文中，將干涉主義取代放任主義，歸為半個世紀以來政治思想變遷的基本趨勢。他強調，現在的政治問題已經不是斯賓塞 (Herbert Spencer) 所謂「個人對國家」的問題，而是白爾克所謂「社群對國家」的問題。當代政治思想之趨於干涉主義，其原因在於：十八世紀的「自由」、「平等」理想至十九世紀下葉已經變為資產階級的擋箭牌，而放任主義政治實為有力階級壓制無力階級的政治。因而工人要求政府干涉資本家，要求取締工廠和改善勞工待遇的立法。政府是為人民謀福利的一種重要工具。現代政治問題不是如何限制政府之權限的問題，而是如何運用這個工具來謀最大多數的福利的問題。在〈我們對於近代西洋文明的態度〉一文中，胡適更明確表達了其對社會主義的同情態度。他指出，十八世紀的新宗教信條是自由、平等、博愛，十九世紀中葉以後的新宗教信條則是社會主義。「社會化」表徵着近代文明進步的趨勢。胡適的這種新自由主義觀念，與杜威式的新自由主義一脈相承。而且，這種調和個人自由與社會正義、主張以政府干預來保障社會福利的新自由主義，亦成為五四以後自由派的思想共識。

胡適的民主觀念亦深受杜威民主思想的影響。胡將民主歸為一種廣泛的現代生活方式，完全是杜威式的民主觀念。杜氏的直接民主思想對胡亦深有影響。胡直至晚年仍心儀杜威故鄉佛蒙特州的直接民主制度，讚譽其為沒有階級、絕對自由、直接實行民權的真正民主社會。

「古典」時代的中國新自由主義

杜威式新自由主義在中國的接受史，是五四以及現代中國的一個重要的思想現象。從清末到五四，中國自由主義的興起和發展，經歷了由嚴復的斯密—密爾式古典自由主義向胡適的杜威式新自由主義的嬗替。胡適新自由主義「新」於嚴復式舊自由主義之處，在於其融入了左翼思想價值的社會化取向。其基本特徵，是追求社會經濟平等，蔑棄經濟自由主義和資本主義，輕忽財產權、經

杜威注重社會經濟改革的新民主理論，頗受新文化領袖陳獨秀的欣賞，在他看來，杜氏關於社會經濟的民治主義詮釋，實為各派社會主義的共同主張。杜氏的直接民主思想對胡適亦深有影響。胡直至晚年仍心儀杜威故鄉佛蒙特州的直接民主制度，讚譽其為沒有階級、絕對自由、直接實行民權的真正民主社會。

濟自由和市場經濟。中國自由主義的五四轉向，打下了杜威左翼自由主義的深刻印記，它表徵着中國古典自由主義時代的終結。

在近代西方思想史上，從十七、十八世紀洛克、斯密式的古典自由主義到二十世紀初杜威式的新自由主義，經歷了二百多年的思想演變，其間伴隨着啟蒙運動、憲政運動、工業革命、市場經濟等一系列現代事件以及現代性的成長。從經濟自由主義到社會自由主義，是自由主義現代性建制化、亦即自由秩序成長為現代文明之基礎以後，自由主義為回應現代社會矛盾和社會主義之挑戰而進行的理論修正。因而，從古典自由主義到新自由主義的變遷，並不單純是一個思想史事件，而是一場涵括思想理念和社會制度的自由主義運動的組成部分。自由主義的現代政治經濟秩序，是社會主義之抗議運動和新自由主義之理論修正的歷史前提。然而中國自由主義的歷史悲劇在於，當它步趨歐美現代化進程而採用啟蒙時代的古典自由主義之時，歐美思想已經歷了從古典自由主義到新自由主義的演變。中國自由主義與西方自由主義的這一不幸時差，使其在尚未戰勝舊勢力而建構自由秩序之時，就過早遭遇了來自歐美之社會主義的挑戰和新自由主義的誘惑。結果在五四時期，嚴復的斯密—密爾式古典自由主義為胡適的杜威式新自由主義所取代，中國自由主義的古典時代隨之而夭折。中國和西方十八九世紀歷史的落差和二十世紀思想的同步，使中國自由主義陷入了「先天不足，後天失調」的困境。

古典自由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理論旨趣的時代差異在於：由中世紀走向「現代」的古典自由主義是一種批判性的自由主義，其主題為爭取自由，即變革專制秩序，建立以個人權利、市場經濟和憲政體制為主要內容的自由秩序。而步入「現代」之後的新自由主義則是一種改良式的自由主義，其目的在於發展自由和完善自由，即擴大自由秩序的階級基礎，使之能夠承載「正義」、「平等」諸社會價值。相距一二百年的新舊自由主義，其價值訴求的歧異，源於二者之前自由結構和自由秩序的不同歷史語境。作為一種高級階段的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的歷史與邏輯前提是自由秩序已然建立，人的基本自由權利已經獲得保障。它所追求的新目標，則是更高的「社會平等的自由」。古典自由主義與新自由主義之間的內在歷史邏輯，是「基礎」和「大廈」。

自戊戌以迄五四，中國自由主義從斯密時代到杜威時代的躍遷，用短短二十幾年時間匆匆走完了西方自由主義二百年的思想歷程。然而，五四的中國並沒有完成早期現代化的歷史任務。憲政民主、市場經濟、個人權利和公民精神，遠未能植根於中國社會。就中國社會的發展狀況而言，五四仍處於現代轉型之初的「古典」時代。而忽視古典自由主義之注重經濟自由和消極自由的思想遺產，正是現代中國自由主義一個致命的理論缺陷。五四以後新自由主義步趨西方左翼自由思潮的理論透支，進一步瓦解了其自身原本鬆軟的思想根基。當身處「古典」時代前自由社會的中國自由主義者擁抱西方新自由主義時，東西方的歷史落差不可避免地導致了中國自由主義之「高調」的理論錯位。這種扭曲時間、趨新驚時的理論錯位，也是二十世紀中國知識份子一再重演的思想喜劇。

自戊戌以迄五四，中國自由主義從斯密時代到杜威時代的躍遷，用短短二十幾年時間匆匆走完了西方自由主義二百年的思想歷程。然而，五四的中國並沒有完成早期現代化的歷史任務。就中國社會的發展狀況而言，五四仍處於現代轉型之初的「古典」時代。而忽視古典自由主義之注重經濟自由和消極自由的思想遺產，正是現代中國自由主義一個致命的理論缺陷。